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一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九期 ——  
(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2a)

---

【读史札记】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京城孤魂
【人物春秋】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何立波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之七）	徐海亮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读史札记】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 京城孤魂 •

“文革”红人徐景贤最近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全书的行文表明其对几十年前的“梦境”仍有深深的留恋和怀念，对梦里岁月不乏粉饰之词。但即使这样，在徐景贤的字里行间也不时能看出那个荒唐年间的不少荒唐事。

徐景贤回忆了当年赫赫有名的游雪涛小组的活动情况。这个小组是专门采用各种特务手法搜集各方情报供张春桥使用的。由于那些特务手法太过卑污，连张春桥本人都说“如果传出去的话，人家会说张春桥搞了一个特务组织”，“游雪涛这样搞法不行，他们的材料太悬了。谁相信了他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会犯错误的。”然而为了整倒对手，张却仍然对游雪涛特别关照，为其秘密安排了永福路244号的高级花园洋房作为活动指挥部，连徐景贤都是事后很久才知道这个地址。为了保密，永福路244号的门牌都拆掉了。游雪涛甚至向徐景贤炫耀说：“春桥同志说，今后他在北京的时间比较多，在上海时间少了，因此正在考虑谁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个人，究竟谁比较适合。”可见张春桥对游雪涛的重视程度。

有了张春桥支持，游雪涛的特务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满足于仅在各个群众组织中打探情报，甚至“把手伸到南京军区许世友那里去了。游雪涛的胆子非常大，居然在简报里写许世友

支持廖国政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游雪涛还把当时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政委、副司令、后勤部负责人等都请到他那里谈话，……摸了很多军队内部的情况，整理了一份《关于警备区整理春桥同志黑材料问题的点滴》，送到张春桥那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国政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指的就是游雪涛和游雪涛小组。”当游雪涛更进一步和主持上海公检法系统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对着干，互相进行侦察、反侦察时，张春桥害怕了，万一激起军方愤怒对游雪涛加以查办，必然会连累到自己。1970年8月张春桥授意徐景贤把游雪涛撤职下放劳动。也许是出于对这样的处理心怀不满，游雪涛对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发表了同情陈伯达的言论，这说明游已经和张春桥不一条心了。游对陈伯达的态度就注定了游的结局。在清查516中，游雪涛被趁机清洗，宣布隔离审查。后来，516基本上都被平反了，而游却一直隔离审查，1975年解除隔离送57干校劳动。“文革”后，游被判刑15年，成了“文革”名副其实的牺牲品，哪方面的好处都没沾到。游雪涛虽然吃准了张春桥与军方的不和，但他走得太远了，张春桥可不愿意为此引火烧身。

张春桥和军队的矛盾由来已久。在1968年4月初一次会议上，张春桥在讲话中传达“揪出杨余傅”时，竟然把揪出余立金说成是揪出吴法宪。这事使一向佩服张春桥的徐景贤十分不解，想不通为什么张春桥会犯这种低级失误。这也许是由于一贯与军方不和，张春桥对吴法宪一伙心怀不满已久，一时失口说出了心里话。这次“失口”事件，加上后来的一连串对张春桥不利的事态导致了“412炮打张春桥”事件。这后面是否有军方的背景？徐景贤没有明说，只是提到“王洪文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炮打。我们说‘参加炮打的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我们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另外，李作鹏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代表军方作出的表态也是十分微妙：“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表面上看，这三条都是中立立场，细心的人不难看出军队态度的偏向，不然就不用禁止“搞反击”了。徐写道，“张春桥后来多次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这场来头不清的“炮打张春桥事件”直到毛泽东亲自召见张春桥，对他说“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这事才算平息下去。

徐景贤参加了1968年10月举行的8届12中全会（扩大）。根据徐的回忆，8届中委共有97人，扣除去世和当时被打倒、揪出的各种反革命、叛徒、内奸、特务，仍有资格出席全会的只剩下40人，还不满半数。这样只得把去世的10名中委由10名候补中委补足，凑够50人，超过中委半数，以便“合法”表决《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其他几个文件。全会把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以及在京国庆观礼的造反派“扩大”了进来，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74人，这样从表面上看超过了全体中委的三分之二多数。这是中共党史上罕见的情况。

在10月31日8届12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陈毅的名字。“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看来，陈毅在毛泽东的眼里一直就是“右”的代表，估计这笔帐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记了。

按照张春桥的部署，徐景贤后来在选举“九大”代表时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在信里，徐景贤有意羞辱陈毅是“右的代表”，并要陈毅回信确认。在“文革”的淫威之下，陈毅不得不含屈忍辱回信表示接受了“右的代表”这个头衔，并对能有这个“右派代表”头衔表示感愧。在“九大”期间，张春桥指示徐景贤等人把陈毅叫来，在上海代表团内召开了批判陈毅的会议，把陈毅从井冈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种“反党罪行”来了个彻底清算，大批特批。直到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把徐景贤、王洪文叫到办公室去，传达周总理指示，批陈要“适可而止”，并说“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虽说有张春桥撑腰，吴法宪的话可以不听，但周总理的指示徐景贤等人不敢违拗。陈毅又过了一关。

徐景贤提到“九大”时，说“有一件事使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在1969年‘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曾经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之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

可见，对于让张春桥作接班人，毛泽东是早有考虑的。甚至就在“九大”党章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字迹未干之际就属意张春桥了。林彪不是傻子，自然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明白自己的“接班人”位子是被随时都会被别人占去的。也许这就是后来导致庐山会议风波和913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徐景贤参加了1970年庐山会议华东组的讨论。对于开会情形，徐景贤做了详细的回忆，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的表现都有记录。然而却偏偏“忘记”了小组会上许世友等人拥护林彪讲话的发言，让人不由对其“记忆”的全面性产生怀疑。但是小组会上全场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的火药味，也有几分说明了主持小组讨论的许世友的态度。

徐景贤提到张春桥在会议期间对他说过：“毛主席对他（陈伯达）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这话很明确地表示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在庐山已经到了你“沉”我“浮”的程度。情况到了如此地步，难怪庐山后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一直无法令毛泽东满意。因为那些人和陈伯达“这头老鼠”一样是另一条船上的老鼠，而他们的检查从未表示要脱离与毛不跑一条航道的另一条船，回到毛当船长的船上来。

在庐山会议中，徐景贤一伙不断地进行“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徐景贤自己就说：“这一天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莫9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江青）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对此，徐景贤并未感觉有什么不妥。不过林彪一伙的类似举动后来却被称为党纪不能允许的“小集团”的“地下串连”阴谋活动，成为他们“反革命集团”的罪证。这种以胜败来论对错的程式直到今天仍然盛行，也可以算是富有传统意味的中国特色之一。

徐景贤回忆说，“二陈合流”的提法是毛泽东在庐山提出来的：1970年9月6日下午，历时15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就是又把陈毅给抛出来了。陈毅本来就是以“右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所以一直是老老实实，但在林彪讲话之后，竟然也敢跳出来“乱说乱动”，要揪毛泽东的红人，这不能不惹得毛泽东勃然大怒，把陈毅和陈伯达相提并论。这件事也说明张春桥在人心确实已是过街老鼠，连戴着“右的代表”帽子的陈毅都忍不住要踢上一脚。然而，毛泽东还是发扬了反潮流精神，力保张春桥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9 1 3 事件后，1 9 7 2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对此表态。徐回忆说，邓颖超就此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读了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这些发言都有简报为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邓颖超与江青有什么特殊关系，但也说明了对于一个人不能仅仅从他说过什么话来判断他对某件事的态度。

在“十大”选举中央委员中，上海候选人名单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手中。徐景贤等人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根本未组织任何党员代表进行讨论推选，在一夜之间就与上海同伙私下拟定了上海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确定后报了上去，至于‘十大’全体会议最后的选举，只是一种程序，结果所有的候选人全部稳稳地当选了。可是，这些新增选的中委、候补中委，大都不是‘十大’代表，没有到北京参加大会；他（她）们自己还都远在上海，蒙在鼓里。”有些当选的委员被连夜从睡梦里喊起来，到北京参加“十届一中全会”，他们稀里糊涂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徐景贤的这些回忆清晰地给我们揭示了“文革”中的所谓党内民主选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念念不忘地拼命鼓吹“文革”的所谓“大民主”。还是请这些人看看徐景贤记录的“十大”中央委员的“民主”选举过程吧。

在徐景贤笔下，毛泽东对于文革造反派的行动一直是情有独钟：1 9 6 7 年 8 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对我说，要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我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4 1 4’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 3 0 万造反派冲砸上海“工总司”和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

为了使王洪文的接班人安排不至于显得过分突兀，毛泽东首先指名要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等人只能担任副主任，成了王洪文的助手。这种安排未经任何党内会议讨论，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但是，党内元老们并不甘心听任“文革派”轻易执掌大权，“在‘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不料，周恩来说话之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当副主席……经过叶剑英一再作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为了清除元老派对王洪文抵制的影响，在全党面前表明自己的坚定挺王立场，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行动。“8 月 2 8 日，‘十大’全体会议将在举行大会选举后闭幕，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通过这一举动，毛泽东在全党代表面前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授予王洪文接班人身份的意愿，为王洪文顺利登场打好了基础。

“文革”中，林彪集团和江青、张春桥集团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陈伯达从江青集团改投林彪集团被说成是“船没沉就跑”的老鼠，结果进了秦城。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就是张春桥文革初期说他在上海唯一要保的两个人之一，艾玲。艾玲是文汇报驻京记者，在“文革”

准备阶段北京上海两地串联，为发动批海瑞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对她十分欣赏，让她回上海担任了文汇报革委会主任。然而和陈伯达一样，艾玲后来逐渐转向了林彪一线，与上海的王维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春桥“听说艾玲的这一动向，吃了一惊。他马上下令要徐海涛副政委核实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徐海涛又一次报告就在上海市四届党代会选举市委领导人之前的那个中午，艾玲又被请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去“吃饭”了……1971年春末的一个傍晚，上海市四届党代会刚刚结束，……张春桥认为时机已到，那天薄暮时分，他突然把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紧急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找你们两个来要办一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对艾玲进行隔离审查！’”艾玲就此被隔离审查。此事表明，早在913之前，林彪集团在各地的耳目就已经开始遭到清洗了。这不能不迫使林立果等人加快了行动步伐。

徐景贤还记述了李先念对邓小平告御状的事，他说“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他（李先念）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其实，在“文革”中，高层领导中这类相互揭发的举动是屡见不鲜，不然就很难自保。这也就是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

在批邓中，为改变政治局里沉闷的空气，加强批邓火力，毛泽东调兵遣将，“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和北大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些“年轻人”不负重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邓小平批得狼狈不堪。在“文革”中，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指定“身边的人”参加作为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会议，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任何游戏规则都是摆设而已。

此时邓小平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邓小平不吭声，不表态，会后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他要面陈一切。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请求不予置理。”可以看出，毛、邓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政治高手，但邓毕竟不是毛的对手。邓小平在上海曾经私下找马天水活动，试图在“四人帮”的根据地里安插一个自己人。没想到，邓看走了眼，马天水虽然是老干部，但却是铁了心的“文革派”。马把邓的策反行为向“四人帮”作了揭发，成为批邓中的一个“重磅炸弹”。

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也有同盟军，“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跟毛远新关系密切，我们与毛远新、陈锡联观点一致，每次我们到中央去开会，都要看望陈锡联和毛远新。”看来，徐景贤把陈锡联算在了己方阵营。另外，丁盛也是徐景贤眼里的自己人，他说，“1976年2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来了两次，在我们房间里把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找来谈话，那时候，马天水的套间变成一个串连点。”王洪文到上海活动时，也经常请丁盛到自己在万体馆的特设包间里一边隐秘地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进行密谈。

批邓之后，“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我们插嘴说：‘他已经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张春桥笑笑，接着说：‘你们今后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能猜透毛泽东心思的看来只有张春桥，毛泽东对林彪提张春桥接班绝非泛泛而谈。

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保留邓的位置的做法并非谨小慎微，而是十分必要的神来之笔。因为在江青、张春桥集团内部也有内讧。先不说江、张究竟谁当老大之争，就是徐景贤也一直就看不上王洪文。在这《十年一梦》里，徐景贤以深文周纳的笔法，充分发泄了他当年被王洪文后来居上，压在手下的那口恶气。借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一事狠狠的讽刺了王洪文一

把，说王“比刘盆子还刘盆子”。1975年徐景贤就曾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揭发”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显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而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在权力圈内的存在，至少可以使得江青、张春桥集团的内部矛盾得到缓和，保证枪口一致对外。

徐景贤写的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使用了文学手法，写了许多不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例如：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在专列车厢客厅里，找许世友和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见两人进来，微微欠动身子……毛泽东把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推，并着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

徐景贤并没有参加这次接见，不知道他是运用的什么功法，竟然在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能够看到毛泽东“微微欠动身子”、“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推”。这些话当然无关大局，但是在有关大局时，徐景贤是否也把自己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写得像真的一样呢？因此，对于书中并非徐景贤亲身经历的记述，看起来就非要十分小心了。另外，对于在“文革”中徐景贤曾经主持或者参与过的案件，如上海轰动一时的林昭、刘文辉、胡懋峰等“反革命”案件，徐洋洋洒洒40余万字的大作，竟然能对这些大案装聋作哑不着一字！由此就不难窥见该人思想角落里的“文革”情结和对那些日子的怀念。

（小注：文中所有引文全部来自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

## 【人物春秋】

###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 何立波 •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 ◇ 早年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三天后，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那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写了一些演唱材料，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7年9月，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给每个团员分发了一个大包东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几块呢子衣料、一包毛线、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于会泳是孝子，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丰厚的东西，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家乡孤苦守寡的母亲。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

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张显发现并没收了。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面前。马少波对于会泳进行了批斗，然后进行了隔离审查。于会泳写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马少波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但是新来的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张波认为重在教育，可以免于处分，最后将于会泳调离文工团，调到协会办的《胶东文艺》编辑部工作。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后，表现积极的于会泳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后重新调回了文工团。

#### ◇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平静生活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于会泳兴奋异常，入学后表现积极。有点音乐天赋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1949年11月，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发展于会泳等人入党。1950年7月，于会泳结束了音乐教育专修班的学习，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音工团搞创作。1952年至1962年，于会泳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研究员，后改任民乐系教员。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新开始的民族音乐课不好上，其他的老师上课被学生评价为“没学问”，而于会泳的课却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别的老师都是放唱片让学生学唱，而于会泳则是自己示范唱让学生学唱，被学生誉为“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研究了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及西方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业务水平大有长进。他编写出版了《山东大鼓》，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他下乡采风时改编过几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等歌曲。他谱写和出版的《女社员之歌》等歌曲和有关音乐方面的著作都别具一格。后来，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目谱曲。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发展。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取得了一些成绩，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在学院工作期间，经同事介绍，于会泳认识了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逐渐产生了感情。1953年秋，于会泳和任珂结婚。在生活安定了之后，于会泳把母亲从山东老家接到上海居住。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后，作为大姐的任珂负担着他们的生活费，于会泳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比较拮据。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工作顺利于会泳，却保持着愉快的精神。

#### ◇ “文革”初期受江青的重视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因为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又是文工队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江青还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

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荡气回肠。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日益加重，后来又把他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于会泳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摸清了江青的爱好，尽力讨好江青。于会泳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院系的领导都要打倒，于是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向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要紧跟。于会泳于是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显示了对他的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在样板戏剧组，于会泳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于是这些对江青不满意的人就遭殃了，或被批判或被判刑。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以及张春桥和徐景贤的全力支持，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过江龙》，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1968年，于会泳带着《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按照规定，上海市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报中央批准。1969年初，名单审查完后，准备报中央。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那天，徐景贤比张春桥先到会议室，组织组负责人告诉他：“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题。”徐景贤很吃惊，觉得事情有些棘手，不敢定夺，准备请张春桥来决定。

在市委常委会上，徐景贤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一点也不吃惊，淡淡地说：“这事我知道。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理由。这封信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嘛！”张春桥这么一说，徐景贤心中有数了。徐景贤在会上发表意见说：“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和负责文教战线的书记徐景贤都表了态，其他市领导也没有人反对。市革委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徐景贤告诉组织组：“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和徐景贤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 ◇ 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中共“九大”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演出就要开始时，帷幕中间忽然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他一反平常拙于辞令的常态，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当着大家的面，江青自然需要故作谦虚一番。她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深受江青器重的于会泳，自然成了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那时候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据“文革”后资料统计，此时上海音乐学院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2人被关押入狱。

在抓样板戏方面，于会泳的确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江青的意志，从不打折扣，连徐景贤也说从没有见过像于会泳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于会泳在京剧方面也算是个内行，他搞起戏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江青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有一次为了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由于于会泳在搞样板戏的过程中忠诚执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对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会泳身体不太好，经常开夜车，便多次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让他补养身体。于会泳很感动，他舍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专门从北京送给“南京路上好八连”，说这是江青关爱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象征。

#### ◇ 在江青的支持下，当上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由于江青的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于会泳为此激动不已。然而江青的“关怀”还不止如此。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关于政府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本来准备让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担任。但是吴德因为已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工作太忙而

婉拒。周恩来于是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于是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他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而是找了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于会泳还专门请了在上海时期对他帮助很大的徐景贤去参观。于会泳得意地告诉徐景贤：“这个大使馆原来有一个特级厨师，最擅长做北京烤鸭，我接收大使馆的时候，把这个厨师也一起接收下来了。”吃烤鸭的时候，徐景贤明知故问：“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转告他们。”以后，文化部长果然不找总理，连副总理也不找。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就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青。

作为江青的亲信，也有跟不上“首长”的时候。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评价很高：“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后很快打电话给徐景贤说：“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于会泳催促徐景贤在上海也要抓几部好影片。

过了几天，江青看《创业》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江青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江青生气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张春桥也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

对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于会泳等人承“首长”江青的旨意，不遗余力地攻击。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便压制悼念周恩来的

活动。1月9日，于会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还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于会泳此举受到了文化界广大干部的质疑。

◇ 在人生的舞台上，于会泳重重地跌倒了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1976年10月初的一天，于会泳给徐景贤打电话，说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马天水走前找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他们都猜不出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于会泳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感到很奇怪。徐景贤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他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徐景贤一再叮嘱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10月8日晚，徐景贤他们不断打电话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徐景贤感到很紧张，他说上海与王、张、姚也联络不上。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把于会泳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

□ 《党史文苑》2005年21期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七）

• 徐海亮 •

（二）组建造反司令部。10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商讨成立统一司令部一事，湖大、华工代表未能取得领导地位，旋而退出组合，自行组织本校的造反司令部。10月2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举行成立大会。该红卫兵司令部后简称武汉二司，以区别于先期成立的湖北省委支持和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湖北省委派员与会表

示祝贺。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被推选为司令员。

王绍光在1980年代调查采访后记载为，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现在华工和湖大，他们的代表认为自己功劳大，他们为筹备司令部起草了宣言和章程，并希望别人承认其领导地位。“他们的气焰激起了其他代表对他们的强烈反感。为了消除他们占据支配地位的可能，后者建议，只有历史清白的党员才能成为主要领导……结果，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杨道远被选为未来的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尽管他在当时并非很有能力胜任这个领导工作”。

武汉大学有当事人回忆说：“在文化革命中，能起来反对党委的少数派学生也是以华中工学院最多，因此在成立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时，也是以华中工学院为主体。大家几乎都愿意由他们学校派人出来担任这个组织的司令。不知是什么原因，最终华中工学院就是没有参加。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在武汉市独占一席的‘新华工’。

“在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里面，原来打算是由华中工学院的同学担任司令，由其它几个学校的学生分别担任副司令。实行常委学校制。武汉大学由于出来的力量不够强大，人数也不多，所以也只是给了一个常委学校的位置。在华中工学院不能来的情况下，这个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就由武汉测绘学院的杨书贵同学担任代理司令，杨书贵就是以后在武汉市文化革命中声名显赫的杨道远。

“继而，杨道远求见张体学，是为了办报的事，主题也就是关于报纸的一些主要问题。具体的说就是1、经费；2、交通、3、印刷；这三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结果，因为在办报这一点上是早已达成一致的。第一，经费问题是张省长不要杨道远多说什么，立即交给杨道远一个存款折子，并告诉我们，这是定额取款的无限存款取款折，每一次只能最多取到300元钱，但是随时取都行，每天不论你取多少次，只要每次取款不超过三百元就行。这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一个聚宝盆了……当时的三百元钱真要办好多事。第二件事是交通，这件事也很快办好了，那就是张省长由省政府车队指定一辆英式吉普车为办报的交通工具。第三件事是确立印刷单位……这件事张省长说，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们的报纸就在湖北省印刷厂印，一切费用由省政府结算，不用你们费心，你们只负责办好报纸，宣传毛泽东思想。正事办完后，张省长非常亲热的拍着杨道远的肩膀说‘你们是革命小将，世界是你们的，我们这些人不行了，跟不上形势了。国家的前途就在于你们这一代了。’听到这一些话我真是激动非凡……”这段回忆之宝贵，在于道出了当时省委对造反学生成立组织、办报搞宣传，还是真心支持的；对于文化革命和互动着的彼此，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十分虔诚认真的。

有回忆说：“10月的水院，对造反派采说，仍如节日的狂欢，每天都有新鲜事件出现，造反派自己装的广播，每天都播出理直气壮，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好多年后，一些外地来过水院的大学生，还给我提起造反派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的起劲。走进造反派集聚的6号教学楼——革命造反楼，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市府，或十月革命时的斯摩尔尼宫，有同学感到6号楼的大阶梯教室，好像当年法国各派争吵的‘国民议会’。……不管怎么说，1966年10月在水利学院是关键。院团委的主要干部，是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他们和一批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反对党委如此对待学生群众，造反参加了少数派的活动。他们也成了一批核心人物”。

与此同时，许多中学造反组织纷纷出现，其壮大得益于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汉阳三中的谢保安回忆：“参加文革……心灵深处就是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满，为改变这些有所奋斗。说参加文革是受感召或者是被蒙蔽，都过于肤浅，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把整个社会彻底搅动了，建国前的根根绊绊，建国后的矛盾纠葛，都是沉渣泛起，在这样的大力搅动之下，都表面化了。各个不同境况的人群，都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

的站队和语汇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造反派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对于当权派使用抓反革命、右派或者纠缠历史问题为手段而排斥异己的不满，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终结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求得自身的解放。由于当权派随意打击和断送别人前途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革初期的50天又有一次高潮，因此这一倾向伤害的人数最多，受伤害也最深，同情他们为他们抱不平的人也着实不少，所以文革中他们就成了运动中最坚定的一群，在十年文革中间始终是当权派的主要对立面。特别是这一派在文革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两报一刊的舆论支持，逐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就必然在文革中成为了主流。我们当时衷心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对人世间的的天平、对强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怀有义愤，因为毛主席亲自为被当权派无情打击的学生平反，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抨击那些恃强凌弱的当权派，是搞‘白色恐怖’和‘形左实右’。在造反派那里就具体到要反对把弱势群体作为打击对象，这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关于‘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大辩论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敢正面对三字兵的极左口号，主要是利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如陈伯达和戚本禹对过激做法的批评。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之后，我们就和他们撕破脸皮干。本来三中的工作组组长是孙德华，与我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我们要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样参加抢黑材料。在舆论准备的过程中，组织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在极左路线中受到压抑的师生经常进行交流，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后来就自然地形成了三中造反派的核心。这些人是三中最能干的一帮人，后来当权派不用这些人都不行。我们起来之后，就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我们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讨论，所有的造反派都赞成。”

另一位当年的中学生也回忆了学校新成立了一些组织，以区别于以前的那种红卫兵，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旗”、“井冈山”各种前缀，他们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当时老红卫兵因为不加前缀并与大多数其他红卫兵组织对立，已被贬称为‘三字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知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势力的骨干”。

在以城市学生为主体的中学里，大致如此。而从笔者当时广泛接触过的中学里两派（包括中学里的“特动”学生）看，各种造反学生的核心和活跃人物，应该是工人、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职员）子弟，即平民子弟；许多省市机关干部子弟、军区干部子弟，则成为所谓“三字兵”的骨干，甚至坚持到1967年夏季。这一情况和目前社会学分析最多的广州市很相似，属于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大城市的文革成员社会特色。

武汉的高等学校略有不同，造反学生以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子弟为主，主要头头多为农民子弟，也显示出地方运动的社会构成特色；而河南籍学生就有四个担任钢二司、新华工头头，以至次年谢富治到汉调侃道“怎么你们河南人都到武汉来当官了”。

为数不多的高干、中层干部子弟、革命军人子弟，按当时中央的号召一般没有承担领导职务，他们埋头实干、兢兢业业，忠实于革命造反；但邮电学院头头张某是新乡军分区司令员的儿子，其他学校也有一些属于“地市级”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弟造反，但当头头的实在不太多。一些知识分子出身和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父母曾参加革命又脱党或受过党内斗争冲击的子弟，则隐之二线，从事幕僚、文字、调研、联络等实际工作，以支持、辅佐纯粹“红五类”的头头。有趣的是，不论学生的出身如何，当年热中于社会活动，如学校文工、体工、宣传（板报、广播）、学生会工作的学生，最先、最多造反，大概他们早已超越系、年级、班的正规党团组织体制，大破了传统保守的教育秩序，最少教条框框，最先在文化、思想的江河湖海联络遨游，他们最敏感和诚挚地接受了毛泽东革命造反的信条。武汉高校的这个特点，在全国其他文革的重点高校里也是非常类似的。

造反行动也始终以大喊大叫为先导。11月初创刊的武汉二司“革命造反报”载文批判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指责他们犯了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三）冲击三级干部会议。11月2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在洪山礼堂召开时，一批二司红卫兵试图冲进会场，宣传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精神和要求旁听传达，被工作人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劝阻，陈进而表示如果省委还执行错误路线，他将和红卫兵一起造反“砸掉这个门”，幼稚激情的学生被笑咪咪的司令打发走了。多数派的舆论立即抨击二司冲击会议的粗暴行为。在15日阎长贵接见武汉少数派学生时，学生反映：“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11月7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1）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2）保留参加权利，（3）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按：指在会散发）。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革命造反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祝祝贺三级干部会议圆满成功》，希望参加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领导干部吸取省委在运动中的教训，把本地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希有更多干部“安全通过社会主义大关”。华中农学院造反者给与会领导同志写信《火烧‘老革命’》：“你们是老革命吗？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否愿意继续革命，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在北京，学生对阎长贵抱怨：“我们冲进会场是因为张体学撕毁了一个协议。我们提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三级干部会。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当时达成了一个协议，结果省委单方面突然开起了这个三级会议。因此，我们就冲进去。我们要列席会议的原因：1、张体学参加了制定十六条，但没有执行；2、不执行军委指示；3、篡改陶铸三点指示（按：指陶铸9月对省委和学生的三点指示，口径不一）。对省委我们信不过，要监督它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因此我们要派代表列席会议”。“11月1日至6日省委仍然违背中央精神。协商张华不同意，回去同张体学同志商量……后来同意两点：1、参加一两次座谈会；2、拿材料来讲，达成协议……但我们要派代表团到中央请示。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4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不知省委如何执行中央指示，我们认为工人斗学生是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太深，搞不清楚湖北省委是怎样贯彻中央指示的。我们感到体学同志仍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是二司成立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事件，其后各执己见，没有解决。虽然阎长贵也劝说学生：“三级干部会议，中央的意见，红卫兵不宜于参加。不参加不就没有事干了？大家想办法来个会内会外结合，他们在这里开会，你们在那里去开，可以印材料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开，让他们内部去斗争，你们会主动。这样对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个极大的支持。在适当的时候，请他出来做检查，你们争取把事情揭发出来。送材料进去一人一份，代表中会有同意你们观点的，等他们开完会后你们再开，开控诉会，一方面符合中央的精神，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群众压力下开会，在这里有个争取群众的问题。不是有少数派吗？你们要争取，你们要相信大多数同学是受蒙蔽的，是可以争取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看的呢？”冲突之际，在11月4日，由各学校东方红红卫兵序列的造反派（含中间倾向群众）组成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他们提出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一些激烈的作法，在学校和社会上也展开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矛头依然指向王任重和省委。以后一段时间，武汉三司将与二司共同战斗，专赴广州揪王任重回汉批斗；直到1967年初分道扬镳。

11月3日至18日，武汉市委举行了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今后两月主要任务是批判资反路线，发动群众，集中目标对准市委；搞好平反工作；切实作检讨，

诚恳接受批评；作好还要大乱一下的准备。（《武汉党史大事记》）

### 三、造反工人组织的崛起

原来所谓的“左”、中派学生也纷纷批判资反路线同时，一个省委更难控制的局面终于出现，即工人造反组织的出现。本来，在八、九月南下学生在武昌活动时，一些年轻、有一定文化、有闯劲的工人，开始零零星星到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到省委所在的水果湖，接触到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学生。在湖北大学的31号楼，工人和学生出现早期的串联。湖大造反师生熟悉武汉情况，而南下造反学生起到串联纽带作用。

王绍光调查后认为，对于工厂、机关和社会上被打成右派、三家村分子、反革命的人来说，“与少数派学生有共同的利益……在8、9月份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些受迫害者顶多就是在自己的单位里建立起秘密的关系网，并通过它来讨论形势，交流看法，更重要的是彼此给予道义上的支持。……9月，武昌城区的湖北大学（当时为一接待中心）成为串联学生的大本营。一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像少数派学生一样下班以后常偷偷跑到湖北大学……于是各种秘密网络形成了”。这些工人“如何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注意，因为这可以成为反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新证据……10月下旬，形势已毫无疑问地对造反学生有利，于是，这些工人积极分子终于决定摆脱疑虑公开宣布他们的存在。10月28日，武昌的这个网络第一次召开独立的群众大会批判湖北省推行的反动路线”。

（一）亲历者的回忆。一机部武汉锅炉厂的沈复礼回忆：“9月份，南下学生点火，说是要炮轰湖北省委。武汉的保守派红卫兵说湖北省委好，把他们说成是‘南下一小撮’。我当时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赞成一小撮的说法，说他们是南下学生的大多数；他们炮轰湖北省委不正确，但是按照十六条是允许的。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王树成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在大字报中说这是要封学生的口，不利于发动群众。当时在大字报上署名的是我和武锅另外的4个人，少数派传抄我这份大字报，结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厂里组织大字报来批判我，发动人来贴我的大字报。当时感到很受压抑，不过同情的人也不少，但是赞成省委好的还是多数。在文革开始的50天内，武锅有3人自杀，我认为这个运动方向是与毛主席的初衷不一致，我就站到了当权派的对立面”。

长江航运总公司船舶设计院的沙云乐回忆：“武汉开始酝酿成立工人总部的时候，有92个人，我参加过最开始的几次会议，朱鸿霞说要去总部，我要在单位内部开展运动。……大概是1966年10月份的时候，我到青山船厂做了第一次讲演，那里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在我讲演完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海员工人战斗总团第一团。我到二航局讲演之后，成立了第二团；然后依次是港务局成立第三团，航管部成立第四团，最后学校医院都起来了，一共成立了18个团，总团设在长航机关里，总团是直属团”。

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回忆：“十六条公布，毛主席的大字报，都认为是打气筒在为我们打气，我们的胆子就壮了，去找工作队辩论，要他们赔礼道歉，交黑材料，做检讨，当时他们也确实做了几次大会检讨。中南局出了动静，李一清就走了，王心学接任工作队队长。秘书长是刘志兰，我们步步进逼，他们就步步设防，呈现胶着状态。因为跟工作队对仗，内部就酝酿成立组织，李洪荣当时没有浮出水面，我们就委托他在外面了解接触。厂里的勤务组由七个人组成，有孟运通、张桂申、李玉合、代诗玉、熊济堂、叶天彪和我。当时还没有正式分工，李、张、孟以找工作队谈判为核心，熊家住在测绘学院那边，就跑大专院校多一些，我和代在内部工作接触多一些。最后由李玉合和张桂申经办，把工作队搜集整理的黑材料给抢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黑材料上这个要控制，那个要怎么样，因为用这种方式整人极为不得人心，结果又促使许多人站到对立面上了，最后造反派在武锅占70%以上”。

工人李承弘回忆：“那个时候，我跟湖大的红八经常有些接触，我们找到陈春茂，他说工人不让成立组织，我就拿了他的袖章，给了一个胡厚民，作为工人分部。……其实当时也有几个工人组织，第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就是余平、余福生他们组织的，机床附件厂的彭国华，工艺厂的胡国基，我们就约了时间在省委13号楼见面，大概有一二十人参加，定了3个主席团名单，俞正启是工人工程师，也是党员，那个时候正是讲血统论的时候，有胡崇元、朱鸿霞、李格、余福生、李文强……勤务组七个人是市委批准的，可以离开岗位不扣工资的，是李承弘、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吉吉）生，这大概是10月底的时候，成立的主席团。成立了有四个党员的政治部，开始是余福生他们”。

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回忆：“当时华工的学生为我们牵线找工人总部，在湖北省委13号楼，设有一个临时性的联络站，但是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班子和组织。我去之前，已经有丁（吉吉）生，余福生，朱鸿霞也在。我去了以后，就开始酝酿成立组织和领导班子，后来组成的班子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党员，我，胡崇元（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党员），李文祥（机床附件厂工人，党员），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党员），郭红兵（城建的），姜诗臣（武重工人），余福生（武汉机床厂工人）。后来就决定成立临时性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据多人回忆，这个最早的工人临时组织，9、10月之际在湖北大学造反派和南下造反大队学生串联下逐渐形成雏形，地点在湖大31号楼，湖大学生陈春茂负责筹备，核心人员有彭国华（武机附件厂干部）、丁（吉吉）生（精细医疗器厂干部）、胡国基（工艺雕刻厂工人）、李洪荣、李文祥（机附厂支书，首任工总党小组长）、余福生、胡厚民、胡崇元、朱鸿霞等，草拟了成立宣言、组织条例，又拟“告全国同胞书”准备通电全国。需要强调的是，该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是申报市委，通过市委认可的；一开始就在组织内建立了党小组，对市委负责。现在应当承认：在成立工人组织问题上，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朦胧地接受了一种理念，按自己的理解指导实际进展，一度比上海市委一乃至中央文革，还要胆大一些！

李承弘回忆：“11月初又增加了党员，市委有联络组，跟我们联络。我们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年生（华工学生）来担任纠察，拿来广播器材，支持我们。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跟市委谈判，提出要成立工人战斗总部，跟我们谈判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他的联络员跟我们联络的，还有张天林参加，他们坚决不同意战斗二字，结果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定了名单，说好张体学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聂年生说你们怎么不坚持战斗二字呢？组织名称里有没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李向阳回忆：“我们就参加在洪山礼堂举行的工人总部成立大会，武锅的李洪荣，武船的李承弘，我和朱鸿霞、刘传福都在台上。武重大概去了几百人，整个礼堂都坐满了。工总成立宣言是我写的，要求省委承认，因为省委不承认，我们当夜就在现场决定马上去北京，省委不支持我们，我们去见毛主席，看他老人家支持不支持。我们就从会场涌到火车站，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不开我们就一直坐在上面不下来，省里面的当权派安排各个单位都派人去劝自己单位的职工回厂，我们车间的副主任李嘉根带人去劝我、胡崇元和姜诗臣回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他说天气蛮冷了不要北上，要我们不要相信学生的宣传。我说我们不能回去，湖北不支持我们要去见毛主席。很晚的时候火车开动了，我们就走了，当时火车上人特别多，我们就是站在椅子背上坐上行李架去北京的”。

（二）工人总部的成立和进京。11月10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俗称“工总”。仪式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书记处书记，时改名为“立公”）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并提前离开，细节问题让赵继续谈。中央工作会议后，张、赵的水平也非同小可，政治、组织上是稳重、守纪的，态度倾向于积极面对和应付群众；而仅仅前一天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曹荻秋就没有



参加，上海市委请示中央、中央文革，答复是：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李承弘回忆说“在我们开会的时候，红卫军把张体学给抢走了，开会武重的人负责纠察工作，最后剩赵修在那里，他只同意联络站，连总部也不同意，结果就谈翻。当时我们想，既然省委不解决，那就只有上北京去了”。李洪荣回忆：“赵修表示他不能代表省委承认工人总部，也不能为工总‘树旗’。由于当时工人都到场了不得不开会，会议开完后又得不到省委承认，于是决定拦火车上北京，当时去北京的大概有好几百人，其中武重的工人最多”。

工人进京了，11月11日，万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群众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并发出致毛泽东主席电。会场的巨幅标语是：“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时，学生与工运的结合还仅仅是个别的行为，不形成组织形式的整体互动。15日，武汉二司学生与阎长贵谈到有工人在北京请愿，但在北京，工人、二司学生尚未一起联合行动，相互仅仅有些知情。湖大学生和南下学生则组织和参与了工人北上情愿。不过，武汉二司学生和工人总部的造反者协同作战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了，特别是在1967年春后者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深感唇亡齿寒的二司学生，义无反顾地掀起反抗“资本主义复辟”、“打倒陈再道”怒潮，为“工总”翻案。其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慨然前往……武汉的学生与工人运动紧密地参合在一起，除河南之外，在中南是罕见的。

武汉工人里发生的事，几乎与上海的安亭事件同时间，性质类似。看来，既然市委同意工人成立组织，省委领导也参加成立大会，那些名称的分歧似乎是很次要的了。实际上当时省市市委对于工人组织如何办，心里实在打鼓，张体学名为被红卫军抢，实为回避麻烦，他还需要到北京看中央态度哩！武汉的问题也发生在火候上，全国，上至中央文革，下到各省市地方，当时正被工人起来建立组织，批判资反路线的强烈要求所困扰，上海和其他地方造反工人的崛起，给文革领导出了难题。周恩来、陶铸，包括陈伯达，都希望运动按照原来制定的文件和精神办，不要延及工业交通战线。这种意见实际上受到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张春桥在毛泽东精神的支持下，私自表态支持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并得到毛泽东的承认。

事情出现转折，王力对此回忆：11月14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武汉工人到北京后住在白石桥国务院招待所，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也在北京各大高校与机关走动，了解全国形势，一些人参加了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的一次接见后胜利返汉。还有人参加11月30日周总理接见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周希望都回本地区搞文化革命。这样大家才回汉，并把胡厚民留在北京，主持联络站。大队回到武汉以后，省市委同意给地方办公，给物资、汽车和经费。仅武汉市政府每个月就给工人总部1500元，到银行去取。于是工人们到政府指定的红楼（当时的省政协办公楼，今阅马场辛亥革命纪念馆）去办公。

武汉工人进京后还参加了一些重大事件。11月12日，上海工总司批判陈伯达致安亭工人电报是“大毒草”。刚成立赴京的武汉工人总部头头，也参加在京的工人活动。王光照回忆：“陈伯达在电报中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认为不对，他是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找他辩论。我们就集中在中南海的西门去，写了大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这样我们十来个人就到了西门，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然后我、朱鸿霞、胡厚民、刘万太、鄂志纯等十个人，排队去西门。警卫战士出来干预，都很礼貌，后来又有一个官长模样的人，来跟我们交涉，

最后一直僵持到晚上，这时首都三司派了许多人来转弯，送来了大白菜汤，馒头窝头还有棉衣，他们当调停人，说回头帮助解决。当时已经是深夜12点，就派大客车把我们送回招待所。……后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我们在那里，首都三司的人说请周总理等人来跟我们见面。……在这次大会上，王洪文也做了发言，他一副上海人的娘娘腔，而且说话内容一点辣汤辣水都没有，跟批判沾不上边，完全讲不到节骨眼上，我们就终止了他的发言。后来听说周恩来、陈毅和童小鹏也是在工体特意接见了工人代表……”。

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此事，次年即被指责为冲击中南海，成为工总被打成“反革命”的罪状。武汉公安局的造反派“公安联司”专门复审此事并向中央汇报澄清，赵振杰后向群众报告解释：“工总实际上是没有冲击中南海，包围了是事实，大概有三百多人……他们片面地理解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说陈伯达同志不让成立工人组织，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坐在那里围着，只有两个人站起来，要求传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但没有冲击”。

李承弘回忆：武汉工人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工人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设立大会保卫组，武汉承担会务，这个会是首都三司操纵和运作的。……开完会之后，我们就从工人体育馆，打着武汉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去中南海的西门，刘万太他们一起，曾经去冲击中南海，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澄清他有没有说‘大道理服从小道理’这个事情，如果有，我们就要求与陈伯达辩论，到底是革命还是生产是大道理。警卫礼貌地把我们拦下了，先有几百人，最后只有十个人，王光照他们晚上就走了。我们当时是想去中宣部，前些时听说陶铸接见过一个代表团（按：应在11日，武汉人未赶上），我和胡厚民坚持到第二天凌晨。后来（30日）周恩来和陈毅他们接见了我们一次，周讲几句话就走了，主要是陈毅讲话，他说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不去，外交部长脸上无光”。

（三）中央领导接见。在毛泽东11日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当天，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汪东兴、童小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小礼堂，接见各地职工共30个单位，90多人。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主持会议，批评道：“你们到中南海西门，不答覆不走，要冲进中南海，前些天门都关上了。请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门都关着，这说明了做接待工作的同志接待工作做得不够，希望大家想个办法。（冲中南海之一的王富春检讨：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到中南海来胡闹，向解放军脸上抹灰，给李富春找麻烦……）

陶铸说：“毛主席批评我们，为什么把西门关起来？怕群众吗？我们工作做得很不够，下午把大门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为什么关门？下午发生了问题。王富春检查很好，不要给他处分。来反映问题都可以，来许多人向里面冲就不好。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这不好。六个国务院副总理讲了这些问题，没讲清楚我们有责任。今天向同志们讲清，希望同志们支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一边说保卫，一边拼命往里冲，这叫什么保卫！对毛主席工作不利，对全国影响不好，影响了主席的工作。过去没有讲清，我们有责任，今天斩钉截铁地和大家谈清楚，我想讲清楚大家也会拥护的。谁不拥护毛主席呢？

“如果真正是修正主义了，应该打倒，都是修正主义吗？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总根子，可我说不是。要信任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司令部不能只有一个司令员……解决问题，主要靠自己革命的办法，依靠自己，依靠革命，依靠斗争，依靠群众。什么国家有那么多民主？我们国家有最大民主，集会、结社、出版、示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今年我快六十岁了，以前我们用铅笔写个标语都要杀头，上雨花台。现在你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口讲，发传单，大字报，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中南海。

“你们不是在中南海外边开会吗？……我不赞成你们到中南海来示威，到中南海只能反映问题，谁有问题还可以向毛主席控告。现在还可以用炮轰，只要有错误就可以轰，轰到最后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关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毛主席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利，有什么不能解决呢？当然，革命现在还是有很大阻力的”。

陈毅沉重又风趣地规劝道：“我以一个犯错误多的同志的名义讲话。是不是你们的行动合乎要求？行动是不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过去我常以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猛打猛冲，结果失败，作检讨，不止一次犯过错误……1925年，我冲过中南海西门，我是四个代表中的一个，有大刀我们也冲进去了；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这里当外交部长，副总理，没想到有人冲我，（陶铸：你们那时冲对了）……你们是不是从反面考虑一下，我是很直说的。过去我常常因为过分相信自己，因而犯错误就更大，多想想就比较好，我是很沉痛地讲这个话。你们满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们。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为革命目的到中南海来要有个界限，不能要冲就冲，坐着不走，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就不走。列宁同志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强调过分会变成错误了”。

之后，陶铸又强调说：“我们做好工作，更好地配合同志们闹革命，我们有这个责任。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跟上，我们改进，你们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不能冲进中南海……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迎宾馆）、广播电台、新华社、外交部、公安部、法院、检察院、国防部，（陈毅同志插话：外交部）你们都不要去！所有的机关都可以批评，你们不要接管机关，我的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刚才讲的地方一律不要去，尽管我们工作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是主张不来中南海是十分正确的，不去这些地方不影响你们革命嘛”！“‘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有人说人民日报社论（按：指《抓革命促生产》）‘比修还修，比混蛋还混’，当然这是个别人的事了。革命和生产不冲突嘛！抓革命促生产嘛，搞革命可以把生产搞好，搞革命停生产是错误的，光搞生产不搞革命也是错误的”。

这次讲话顿时以传单形式遍及京城。应该说，被舆论批为最大的“保皇派”的陶铸以及陈毅在当时的真诚心声，打动了青春、纯情、热忱——初到北京的武汉工人造反者心扉的。

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问题的争论略微平息，为了回答进京工人提出的问题，在11月30日周恩来与陈毅又接见全国工人群众代表，在京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全总主任刘宁一主持会议，周恩来、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周荣鑫、谢镗忠、童小鹏、马纯古参加。武汉在京的工人造反派数人参加此次会议（按：有人回忆是11月24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接见的，情况不确；周总理出席工交会议修改讨论稿，次日又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24日似无精力与时间安排工体的接见）。

由于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如何深入搞，已经统一了意见，文件正草拟之中，所以周在简短的开场白里讲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在十六条上规定了。对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以下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我们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向广度、深度发展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首先是影响大城市，接着是中等城市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所以，同样这些单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共同性，有些问题有特殊性。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准备写一个关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来解决这些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正在起草当中。如果起草成功，还要把草案发到大中城市的厂矿企业中给广大职工讨论，征求意见。所以，今天晚上的会见，不能把未正式讨论的决定向大家讲，个别问题要谈，但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谈”。

诚然，他的这些心里话听众一时不能明白就里，不过大家总算听说会有新精神以至新文件

了。所以总理离场，请陈毅讲话，陈老总潇洒一番，大谈老百姓难听到的国际形势后，全国来京职工也就满意地散会，打道回府了。不过他们也难以真正听得下陈毅苦口婆心开导的宗旨，这就是：“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像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还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总之，武汉最初的工人造反派意想不到他们首次的造反，就参与到1966年11月全国的大事——工矿企业运动深入的旋涡里，他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聆听了周恩来、陶铸等众多中央要人的讲话，得到刘宁一、马纯古等工会领导人的接见，表态支持。他们见到各地的工人造反者，交流切磋，他们的头脑思绪一下开阔了许多。有研究者觉得，按王绍光调查，武汉工人头头多是一些落后、调皮，无事生非的人；这大概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

当时“红五类”和“出身论”的舆论影响甚广，要公开出面表述观点和牵头造反，必须自身“比较干净”和“血统高贵”，要如古代武士兵戎相见，事先申明自己出身、门第。“有问题”和“落后”者，往往自惭形秽，逡巡不前。最先能够出头造反的工人、干部，绝大多数是穷苦出身，本人是学徒、工人出身，多数是党团员，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与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1966年春当局重用过的四清、文革运动骨干；甚至自己就是单位或车间的党支部干部。他们树旗造反也好，还是进京上访也好，当初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略微不同的意见，为了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为了公开控诉他们当时认为的省委和本单位领导的不公。他们并不知道中南地区文革的领导人物陶铸、王任重地位日趋式微。此后他们得以在武汉节节进取、胜利，得以在全国逐渐有了显赫的声誉，全仰仗毛泽东决心把文革运动向全社会深入开展，决心批判老一辈革命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踌躇麻木，决心来一次他心目中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真正、全面、广泛的演习。这些工人、干部的文革积极分子更想不到的是，他们还将继续给毛泽东、周恩来制造“麻烦”：由于造反，1967年春他们被再次打成非法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工总”组织被取缔，核心领导和积极分子身陷囹圄；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临武汉，坐镇武汉解决问题，为他们平反翻案，从而惹翻了深信造反派依然是“反革命”、“坏分子”的传统体制及其社会基础……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005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